

潘军小说典藏

《白》《蓝》《红》三部曲

Dubai Yu Shoushi · Lan

独白与手势·蓝

潘 军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潘军

潘军小说典藏

《白》《蓝》《红》三部曲

独白与手势·蓝

潘 军/著

Pan Jun Xiaoshuo Diancang

Dubai Yu Shoushi · La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独白与手势. 蓝/潘军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7

(潘军小说典藏)

ISBN 978-7-5396-6388-3

I. ①独… II. ①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1058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出版策划: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张妍妍

出版统筹: 姜婧婧 张妍妍

装帧设计: 徐 睿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版自序

秋天里回合肥，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朱寒冬先生建议我，将过去的小说重新整理结集，放进“作家典藏”系列。作为一个安徽本土作家，在家乡出书，自然是一件幸福的事。况且他们出版的“作家典藏”系列，从已经出版的几套看，反响很好，看上去是那样的精致美观。我欣然答应。这也是我在安徽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出书，有种迟来的荣誉感。寒冬是我的校友，社里很多风华正茂的编辑与我女儿潘萌也是朋友，大家一起欢悦地谈着这套书的策划，感觉就是一次惬意的秋日下午茶。这套书，计划收入长篇小说《风》，《独白与手势》之《白》《蓝》《红》三部曲和《死刑报告》；另外，再编入两册中短篇小说集，共七卷。这当然不是我小说的全部，却是我主要的小说作品。像长篇小说处女作《日晕》以及若干中短篇，这次都没有选入。向读者展现自己还算满意的小说，是这套自选集的编辑思路。

每一次结集，如同穿越时光隧道，重返当年的写作现场——过去艰辛写作的情景宛若目下，五味杂陈。从1982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起，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光，作为一个写作人，让我感到最大不安的，是自觉没有写出十分满意的

作品。然而重新翻检这些文字，又让我获得了一份意外的满足——毕竟，我在字里行间遇见了曾经年轻的自己。

不同版本的当代文学史，习惯将我划归为“先锋派”作家。国外的一些研究者，也沿用了这一说法。2008年3月，我在北京接待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计划”采访我的日本中央大学饭冢容教授，他向我提问：作为一个“先锋派”作家，如何看待“先锋派”？我如是回答：“先锋派”这一称谓，是批评家们做学问的一种归纳，针对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出现的一批青年作家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与创新，尽管这些创新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某些流派作家的影响，但“先锋派”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小说的范式。这些小说在当时也被称作“新潮小说”。批评家唐先田认为，198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白色沙龙》，是我小说创作的分水岭，由此“跳出了前辈作家和当代作家的圈子”而出现了“新的转机，透出了令人欣喜的神韵和灵气”。这一观点后来被普遍引用。像《南方的情绪》《蓝堡》《流动的沙滩》等小说，都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品。这些小说在形式上的探索是显而易见的，带有实验性质，而长篇小说《风》，则是我第一次把中短篇小说园地里的实验，带进了长篇小说领域。它的叙事由三个层面组成，即“历史回忆”“作家想象”和“作家手记”。回忆是断简残篇，想象是主观缝缀，手记是弦外之音。批评家吴义勤有文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潘军在中国新潮小说的发展中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而长篇小说《风》更以其独特的文体方式和成功的艺术探索在崛起的新潮长篇小说中占一席之地。”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小说的创作就是对形式的发现和确定。如果说小说家的任务是讲一个好故事,那么,好的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讲好一个故事。“写什么”固然重要,但我更看重“怎么写”。这一立场至今没有任何改变。在我看来,小说在成为一门艺术之后,小说家和艺术家的职责以及为履行这份职责所面临的困难也完全一致,这便是表达的艰难。他们都需要不断地去寻找新的、特殊的形式,作为表达的手段,并以这种合适的形式与读者建立联系。对于小说家,小说的叙事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叙事是判断一部小说、一个小说家真伪优劣的尺度。一个小说家的叙事能力决定着一部作品的品质。

与其他作家不同,我写小说首先必须确定一个最为贴切的叙述方式,如同为脚找一双舒服的鞋子。而在实际的写作中,又往往依赖于自己的即兴状态,没有所谓的腹稿。在我这里的每一次写作,不是作家在领导小说,依照提纲按部就班,更多的时候是小说在领导作家,随着叙事的惯性前行——写作就是未知不断显现的过程。《风》脱胎于我的一部未完成的中篇小说《罐子窑》,我认为《罐子窑》的结构与意识,应该是一个长篇,于是就废弃了;长篇小说《死刑报告》最初写了三万字,觉得不是我需要的叙事方式,也废弃了;《重瞳——霸王自叙》则有过三次不同样式的开篇,直到找到“我讲的自然是我的故事,我叫项羽”才一气呵成。等到了长篇三部曲《独白与手势》,我开始尝试把图画引入文字,让这些图画变成小说叙事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文字和绘画,构成了一个复合文本。《死刑报告》后来决定把与故事看似不相干的“辛普森案件”并行写入,使其形成

了一种观照，也就构成了中西方刑罚观念的一种比较与参照。这些都表明，即使在所谓先锋小说式微之后，我本人对小说形式的探索依旧没有停止。如果说我算得上先锋小说阵营里的一员，那么，所谓的先锋其实指的是一种探索精神。

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换言之，我毕生都在追求自由散漫。当初选择写作，看中的正是这一职业高度蕴含着我的诉求。通过文字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与自由表达，以此建筑自己的理想王国，这种苦中作乐的美好与舒适，只有写作者亲历才可体味。然而几百万字写下来，我越发感受到这种艰难的巨大，原来写作的路只会越走越窄。同时我也清醒地意识到，今天的写作未必都是自由的。于是我的小说写作，便于1990年暂时停歇下来。两年后，我只身去了海口，后来又去了郑州，自我放逐了五年。虽然那几年过得身心疲惫，但毕竟还是拥有了一份可贵的自由。另一个意思，是我乐意以这种方式将自己从所谓的文坛中摘出来，心甘情愿地被边缘化。我喜欢独往独来。批评家陈晓明曾经说我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人物，“具有岩石和风两种品性，顽固不化而随机应变”，指的就是这个阶段，但我的这种应变却是因为现实的无奈与无望。我深知写作不仅是一个艰难的职业，更是一个奢侈的职业。决定放弃一些既得利益，就意味着今后必须自己面对一切，单打独斗。其实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真的下过海，倒是向往江湖久矣！我必须换一个活法。1996年2月，我在郑州以一部中篇小说《结束的地方》，结束了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重新回到阔别的案头。

我开始思考，“先锋派”作家一直都面临着一个挑战：形式

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阅读的广泛性。尽管这些作家不会去幻想自己的作品成为畅销书,但从来不会忽视读者的存在,至少我是如此。实际上,阅读也是创作的一个构成元素。很多年前我打过一个比方:好小说是一杯茶,作家提供的是茶叶,读者提供的是水。上等的茶叶与适度的水一起,才能沏出一杯好茶。强调的就是读者对创作的参与性。我甚至认为,好的小说作家只能写出一半,另一把是由读者完成的。我希望自己的小说好看,但先锋作为一种探索精神不可丧失。毕竟,小说不是故事,小说是艺术,是依靠语言造型的艺术,是语言的“有意味的形式”。小说更是一种人文情怀的倾诉与表达。我要尽力去做的,还是要向大众讲好一个好故事。这之后,我陆续写出了《海口日记》《三月一日》《秋声赋》《重瞳——霸王自叙》《合同婚姻》《纸翼》《枪,或者中国盒子》《临渊阁》等一批中短篇以及长篇三部曲《独白与手势》和《死刑报告》。我骨子里“顽固不化”的一面再次呈现而出。批评家方维保说:“对于潘军可以这么说,他算不得先锋小说的最优秀的代表,但是他确实是先锋小说告别仪式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正因为潘军的创作,才使先锋小说没有显得那么草草收场,而有了一个辉煌的结局。”这当然是对我的鼓励,但始料不及的是,八年后,我的小说创作再次出现了停歇,而这一次的停歇,我预感会更长。果然,一晃就过去了十年。

我又得“随机应变”了。这十年里,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到了影视导演上。因为这种突兀的变化,我时常受到了一些读者的质疑与指责。但他们却是我小说最忠实的读者,我由衷地感谢

他们，诚恳地接受他们的批评。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工作并未就此结束，只是暂告一段落。十年间我自编自导了一堆电视剧。这看起来是件很无聊的事情，但我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热身，接下来我会去做自己喜欢的电影。由作家转为导演，本就是圆自己一个梦，企图证明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野心。我要拍的，不是所谓的作家电影，而是良心电影。这样的电影之于我依然是写作，依然是发自内心的表达。但是，这样的电影不仅难以挣钱，也许还会犯忌，所以今天的一些投资人早就对此没有兴趣了，而我却一厢情愿地自作多情。他们只想挣钱，至于颜面，是大可以忽视的。更何况，要脸的事有时候又恰恰与风险结伴而行。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的兴趣自然又一次发生了转移——专事书画。写作、编导、书画，是我的人生三部曲。近两年我主要就是自娱自乐地写写画画。其实，在我成为一个作家之前，就是学画的，完全自学，但自觉不俗。我曾经说过，六十岁之前舞文，之后弄墨。今天是我的生日，眼看着就奔六了，我得“hold（稳）住”。书画最大的快乐是拥有完全的独立性，不需要合作，不需要审查，更不需要看谁的脸色。上下五千年，中国的书画至今发达，究其原因，这是根本。因此，这次朱寒冬社长提议，在每卷作品里用我自己的绘画作为插图。其实，在严格意义上，这算不上插图，倒更像是一种装饰。但做这项工作时，我意外发现，过去的有些画之于这套书，好像还真是有一些关联。比如在《风》中插入《桃李春风一杯酒》《高山流水》《人面桃花》以及戏曲人物画《三岔口》，会让人想到小说中叶家兄弟之间那种特殊的复杂

性；在《死刑报告》里插入《苏三起解》《乌盆记》《野猪林》等戏曲人物画以及萧瑟的秋景，或许是暗示着这个民族亘古不变的刑罚观念与死刑的冷酷；在《重瞳》之后插入戏曲人物画《霸王别姬》和《至今思项羽》，无疑是对西楚霸王的一次深切缅怀。如此这些都是巧合，或者说是一种潜在的缘分，这些画给这套书增加了色彩，值得纪念。

书画最大限度地支持着我的自由散漫，供我把闲云野鹤的日子继续过下去。在某种意义上，书画是我最后的精神家园。今年夏天，我在故乡安庆购置了一处房产，位于长江北岸，我开始向往叶落归根了。我想象着在未来的日子里，每天在这里读书写作，又时常在这里和朋友喝茶、聊天、打麻将。我可以尽情地写字作画，偶尔去露台上活动一下身体，吹吹风，眺望江上过往帆樯，那是多么的心旷神怡！然而自古就是安身容易立命艰难。我相信，那一刻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电脑里尚有几部没有写完的小说，以及计划中要拍的电影，也不免会一声叹息。我在等待，还是期待？不知道。

是为序。

潘军

2016年11月28日于北京寓所

目 录

新版自序 / 1

犁城:1992年3月 / 3

海口:1992年4月 / 16

犁城:1992年6月 / 32

海口:1992年9月 / 50

广州:1992年10月 / 68

犁城:1992年11月 / 81

海口:1992年12月 / 97

海口:1993年3月 / 117

犁城:1993年8月 / 131

海口:1993年10月 / 147

三亚:1994年4月 / 165

海口:1994年5月 / 180

蓟州:1994年6月 / 195

蓟州:1994年9月 / 215

犁城:1994年10月 / 228

海口:1995年2月 / 243

附录一 《独白与手势·蓝》初版后记 / 259

附录二 《独白与手势》修订本自序 / 262

附录三 存在主义和潘军的《独白与手势》 吴格非 / 264

那时候我觉得,海的喜怒无常和云的变化莫测,是人生的自然版本。

但更多的时候,我愿意凝视她可疑的美丽。

——作者题记

丁亥年
为作图
于



犁城:1992年3月

犁城的3月是令人沮丧的。前一个冬季滞留的干燥使新春显得毫无生气。然而这又是一个无法躲避的季节。那时候他整天伏在桌上,不是写作——他已经歇笔两年,而是修筑桌上长城。孩子快上学了,他也由省委机关去了文联,时间突然多出了一大块,如何填满倒成了问题。无聊似乎第一次真正显示出来,而消除无聊最好的方式就是打麻将。有时他居然一个人打四方,嘴中还念念有词:他妈的怎么就不上牌呢?这个男人的形象也变了,胡子蓄得很长,头发也很长,看上去像一个晦气十足的流浪艺术家。这么一个人每天趿着拖鞋在“红门”里晃悠便时常引起哨兵的警惕,他们总爱下意识地盘问他,让他出示工作证,而他的工作证已经交出去了,于是就得费些口舌。他当然也恼火,有一次还几乎同当兵的吵了起来,他说:我是不是看着像个坏人?毛泽东长征时头发比我还长,周恩来的胡子也比我长,你觉得他们有哪儿不对劲吗?

他想这地方不能待了,可是不待这儿又待哪儿呢?如果有一笔钱就好了,就可以另买一套房子,不再住这鸟地方。钱就是个好东西。钱有时候就能为你买回个公道。林之冰这句话没错。钱还会给你赎回一个尊严。很久以前他就认为,当代中国

出现过两次奇特的革命。第一次是1966年,革命的结果是神与人的距离消失了。第二次是1978年,以权与钱的交换作为收获。二者都是有悖于革命的初衷,却给中国人以意外的欣喜。这种喜悦绝不亚于1949年翻身解放带来的。人们发现自己长高了,不再习惯仰视他人。面对一种叫作权力的东西,大家完全可以用金钱加以抗争,至少能够平衡自己。你是厅长你能住四室一厅,但我可以掏三十万买同样的甚至更好的房子。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有本事挣钱的话。这总比仰人鼻息夹尾巴装孙子强一点也容易一点。他想,我倒是该动动这个脑筋了。离开机关的这两年他倒是做成了两笔生意。一笔是同一个驾驶员倒卖了两箱酒,另一笔是给电视台拉了个广告。两笔所得两千多,也没费什么功夫,心里还很滋润。他想当初如果李佳支持自己搞公司没准现在就已经发了。自从脱离机关后,李佳的情绪似乎变好了一些,很少有牢骚,也能容忍他彻夜不归地打麻将。他觉得有点奇怪,但是一种不祥的预感总时常掠过他的心头。他想这肯定不是个偶然。分居的事实丝毫没有改变,冷战的局面越发完美,很像一场巷战的间歇,寂静意味着更大的恐慌。

另一件困惑的事是几年前飞到海南的林之冰一去没有音讯,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这只风筝在梦中是非常美丽的,像尔瓦多·达利的绘画,具有强烈的动感和惊人的想象力,而且还有温度。风筝飘逸的翅膀最后总幻变为女人劈开的双腿,映衬于蓝色背景之上。那是一片纯粹的蓝,大陆上是无法寻见的。后来,风筝消失了,只剩下了这片蓝色。1992年的春天因为梦中的这

片蓝色渐渐变得有些可人，而暖风却是从一个老人手臂之下吹向大陆的——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使这个国家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巨变，让人惊喜而不知所措。人们仿佛看见了一种被称作希望的东西又出现了，无梦生涯行将宣告结束。对于随时可以放弃梦想的中国人来说，这个春天无疑是值得纪念的，因为它意味着权力的回归。梦想的权力。

犁城以其习惯的步调跻身于春天的行列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她的投影似乎更有趣，不出几日，几乎所有的机关门面都挂上了一块牌子，上书某某公司，成为一大景观。而公开的解释无比理直气壮：这就是改革。这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机关有总公司，每个处室还可以设分公司，人尽其才，各显神通，有权吃权，有智吃智，无权无智则搞点小本营生。李佳的单位把作息时间都改了，早上七点上班，各人去菜市场买菜，集中起来，女的洗男的切，井然有序。下班提前一小时，全体到街上卖盒菜。谁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放不下架子？一周下来，人均分得三十七块，这利润还算少吗？我们不笨，只要上面给政策。文联的人是清高的，要做的不过是把沿街的办公室改成商用门面，包租出去，得钱而省力。文联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单位，文件上不是说要内部挖潜吗？于是就这么挖了。那些日子，犁城的天空充满了欲望的气息，街头巷尾一片发财声。犁城历史上出产一种臭豆腐干子，再次成为城市的门面似乎理所当然。外省人来此一游，首先不习惯的是满大街的臭干味和让你睁不开眼的杨花飞絮。但是一顿饭之后，客人的印象不经意地改变了，臭干子产生的亲和